

功能翻译理论的补充与发展

——介绍奈达近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时 和 平

尤金·奈达这个名字在我国翻译界并不陌生，过去几年中他曾四次来华，先后在北京、广州、南京、上海等地讲学，并与中国学者就翻译理论和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的两部主要论著《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国内已有系统介绍，他与金隄教授合著的《论翻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基础之上的，他强调信息的忠实传递，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及社会文化背景。奈达的基本理论在6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二十年来，他又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使其进一步充实完善。及至80年代初，他的研究几乎包罗了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从翻译的标准、过程、方法到可译性，从语音、语法、语义到语境，从社会文化背景到心理因素，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是，年逾七旬的奈达博士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吸收有关领域的新成果，竭力使自己的理论更深入、更合理、更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即是这种努力的又一成果。

该书由美国圣经协会翻译部顾问让·德·瓦尔德(Jan de Waard)与奈达合力写成。由于书中例证全部取自圣经翻译，作者加了一个副标题——“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在写作过程中，瓦尔德主要负责从《旧约》中挑选例证并阐明其神学意义，奈达则负责理论部分的编

写并提供《新约》中的例证。全书约二十万字，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讨论交际活动的性质，另外对全书结构作一概要介绍。第二章从几个不同侧面对翻译活动的要素进行分析，涉及语言的交际功能、译者、读者、信息、形式对应与功能对等、不同种类的翻译以及可译性。第三章着重阐述由于通用语和方言之间、各种语体之间的差异而引起的翻译上的困难。第四章论证了“翻译即译义”(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的观点，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意义”(meaning)和语言符号的功能加以阐述，强调了“同形结构”(isomorphs)在理解原文中的作用，并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了意义和大脑的关系。第五、六章主要谈修辞功能和修辞手段。第七、八章分别论述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书末还有两项附录，一是各种翻译理论简介，一是《圣经》翻译出版的程序，二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总结，部分内容难免与以前的论著重复，因此，本文不拟逐章介绍，而仅就新的提法和过去未曾深入讨论的内容作一综述。

一、功能对等

熟悉奈达翻译理论的人，在阅读该书时首先注意到的必定是“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这一术语，因为以前奈达一直用“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来表述同一概念。书的序言中解释说，“功能对等”与“动态对等”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变换的原因主要是“动态对等”常常被误解，致使许多《圣经》译者无意中严重违反了其指导原则，采用“功能对等”这一术语旨在突出翻译的交际

功能,消除误解。在第一、二章中,作者对功能对等进行了论证,指出,如果一个信息无关紧要,就没有必要去翻译,但如果一个信息很重要,把它弄得模糊不清显然没有好处,除非原文作者故意采取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书中批评了那些热衷于保持《圣经》语言“古风”的译者,认为《圣经》传达的是上帝的旨意,其语言对古代的读者和听众来说是浅显易懂的,今天没有任何理由为追求语言的精美而阻碍平民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作者重申了《翻译科学探索》中提出的翻译标准,即最接近原文的、自然的信息等值,但对“信息”(message)作了进一步界定,申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包括语言形式。

为了奠定“功能对等”的基础,书中对语言的多种交际功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作者把这些功能分为九类,即表现功能(expressive)、认识功能(cognitive)、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信息功能(informative)、祈使功能(imperative)、仪式功能(performative)、情感功能(emotive)、美感功能(aesthetic)和自我描述功能(metalingual)。作者认为,判定原文的语言功能对理解和表达两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的论著中,奈达一般将“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与“动态对等”对立起来,提倡尽可能准确自然地传递信息,反对拘泥于原文形式,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改变原文形式则未曾论及。这一缺陷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得到了弥补。作者列出了五种典型情况,限制了变换形式的范围,从而在理论上排除了任意背离原文的做法。这五种情况是:(1)直译会导致意义上的错误;(2)外来语导致语义空白(semantic “zero”),读者有可能自己填入错误意义;(3)形式对应导致严重的意义不明;(4)形式对应引起原文中不存在的模棱两可意义;(5)形式对应违反译入语语法或损害译文语体和谐。作者在列举了上述情况之后指出,不同语言在表达内容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根本区别在于表达方式,因而译者的主要任务是找出译入语内各种有效的表达手段。

二、意义

意义的理解与分析是这部专著的另一重点。作者从社会符号学出发,论述了语言符号的相互依存性,说明了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一样,只有在系列对比中才具有意义。作者把理解符号意义的过程分为“即时”(immediate)、“分析”(analytical)、“综合”(synthetic)三个层次,如在“他们在酋长的儿子落水之后才在河上架桥”这句非洲谚语中,第一层次上读者只领会到描述的事件,第二层次上注意到因果关系及强调重点,第三层次上则了解到社会文化背景。作者认为,用社会符号学的观点解释翻译现象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它强调了一切与译文有关的因素都具有意义,包括词汇、语法、修辞手段以及语言之外的因素。

作者还论述了“同形结构”在翻译乃至所有交际活动中的作用。一方面,人们在表情、想象力、语法结构、语义类别、认知和描述能力上存在着部分同形结构,使交际活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全一致的同形结构,又会给交际活动造成某些困难。

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奈达曾把意义分为平行的三类,即语法意义(linguistic meaning)、所指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和感情意义(emotive meaning),这次又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改进。在术语上,他用designative代替了原来的referential,使概念更明确,又用associative(关联的)代替了emotive,扩大了概念的外延,从而包罗了一切伴随意义。在分析程序上,他从修辞、语法、词汇三方面分别入手,然后展开对每一方面所指意义和关联意义的分析,使语义分析更加深入。

三、修辞

有关修辞的论述可以说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新内容,在该书中占了整整两章。作者把修辞意义大致分为整体感(wholeness)、美感(aesthetic appeal)、强度(impact)、得体(appropriateness)、对应(coherence)、粘着(cohesion)、中心(focus)、强调(emphasis)等八类,又把能够表达这些意义的手段分为重复(repetition)、



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上)

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所 杨建钢

近年来,纽马克、卡特福德、巴尔胡达罗夫、奈达等已渐渐成为国内译界所熟悉的名字。《中国翻译》陆续介绍了国外的翻译理论,其中有英美的,有德国的,有苏联的,但迄今尚不见素来在欧洲思想文化领域居先导地位的法国的。是法国没有翻译理论家,无翻译理论可谈?显然不是。笔者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过程中接触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现整理成文,旨在为我国译界再提供几颗“他山之石”。

一、法国翻译理论研究发展概貌

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上半叶。在这一时期,法国尚未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只是有些作家和译者就某个具体译作对翻译问题发表过一些见解、议论而已。翻译本身还被看作一个文艺美学、文体论和文评方面的附带问题。作家们的议论也多半是从文学性角度而发。如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曾对马尔杜斯的《一千零一夜》法译本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大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在《田园诗译序》里阐述的对翻译的见解。当时,一些重要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法译本的问世常常在报界引起争论。如1955年《莎士比亚全集》新法译本的出版

曾招致一场论战,《圣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的译本亦每每唤起以译文的文学性为题的传统论争。1927年的《南方纪事》杂志上刊登过一篇“关于文学翻译的调查”,搜集了当时许多法国作家对于翻译的看法。瓦莱里·拉尔波1946年发表的《祈求圣·热罗姆》一书更是大量地搜集了这方面的见解。这个时期作家们关于翻译的思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纯粹的主观性。这类思考“涉及的多是文学感受,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数量浩繁的例证、直觉的堆砌、种种诀窍、空泛之谈乃至经年不休的陈说,以及夹杂着大量精心观察的事实而未经理论的武断结论的汇集”。(乔治·穆南《语言学与翻译》第89—90页。)第二,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以及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和术语。第三,带有较强的论战性质。因此,在这个时期,尽管人们积累了大量关于翻译的经验、见解和思考,其中许多也不乏重要性和启示意义,但是,正如穆南所说的,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关于翻译的“手工艺经验论”而已。

整个50年代可视为法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1947年,法国翻译家协会成立。在它的积极倡导下,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也于1953年诞生。这标志着翻译工作者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在社会生活中起越来越

浓缩(compactness)、连接(connectives)、节律(rhythm)、判断演变(shifts in expectancy)、类比与对比(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等六类。作者在分类之后对每一种修辞意义和修辞手段都进行细致的分析,并探讨了在翻译中怎样选用各种修辞手段。如在谈到重复时,作者

指出,译者不应寻求在译入语中重构其形式,而应首先分析这一修辞手段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是用于强调还是用于连接,或者用于其他功能,弄清修辞意义之后,就有可能选用译入语中最恰当的修辞手段来造成同等效果。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虹)